



“迷失”于现代的村庄，被围困的乡村政治，深陷于现实危机的梁庄人……

**梁莊**不为人所知，它只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它戳破了过去，但未必能指向未来。

本书为试读版，完整版请淘宝搜索店铺“菜根阁”购买。另有 mobi、epub 格式赠送。店铺中还有海量电子书可供选购，如侵犯您的版权，请联系店主删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在梁庄/梁鸿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214-06510-0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200452号

书名 中国在梁庄

著者 梁鸿

责任编辑 李湛

特约编辑 俞芬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数 199千字

版次 2011年3月第2版 2011年4月第7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10-0

定价 25.00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 前言 从梁庄出发
-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 回到穰县
  - “迷失”在故乡
  - 梁庄往事
  - 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 第一代打工者：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家
  - 我的族人：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
  - 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
  - 湍水：开满菊花的河岸
  - 县水利局副局长：我管水，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
- 第三章 今天的“救救孩子”
  - 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
  - 芝婶：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 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
  - 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 第四章 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

- 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
-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
-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
- 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 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

- 第五章 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

- 清立：无论走到哪儿，刀不能离身
- 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墓地里
- 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 清道哥：我这支书干了一辈子，可自己的家都没管好

- 第六章 被围困的乡村政治

- 梁光正：我没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我的麻烦
- 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
- 现任村支书：让谁干这活就是让谁累死
- 县委书记：农村正在渡过一个危机期

- 第七章 农村的“新道德”之忧

- 明太爷：我这一辈子算是叫“主”给坑了

- 灵兰：“神”的好儿女
- 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
-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 赵嫂：现在不管孙子，以后还想不想活
- 万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 第八章 乡村的未来梦想

- 困在泥淖中的乡村
- 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 梁庄的“华丽”转身
- 寂寞的文化茶馆和戏台子
-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 后记

## 前言 从梁庄出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



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因此，一直有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

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

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的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

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我并不认同乡村已经完全陷落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乡村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废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

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的眼睛和有限的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涵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

因此，如果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这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

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

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 第一章 我的故乡是梁庄

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的穰县，距城区40公里。穰县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的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的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

——《穰县县志·概述》

## 回到穰县

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稍不舒服他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用两腿圈着他，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我只好坐起来，打开床头小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和科德海角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无所不在的海滩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

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常常被比做舞台之壮观场景的人类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

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因为生活的天赋取自大地，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些天赋是拂晓鸟儿的歌声，是从海滩上观望到的大海的黄昏，以及海上群星璀璨的夜空。”我被作者的抒情深深吸引。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在那里，人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更是恒久的，因为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掀开窗帘，火车在朦胧的夜色中疾驶，大地、树木、庄稼一掠而过，掩映在树木中的房屋沉默着，隐约可听到夜晚的呼吸。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了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们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

清晨，火车缓缓地驶向县城，看到县城里那座桥的时候，我知道，穰县就要到了，这是我旅程的第一站。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只是将暗，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那年我十三岁，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第

一次见到火车，县城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轮月亮，有一种难以企及的美感。但是，天色将黑，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的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在一座楼面前，我徘徊了好长时间，我想进去，我隐约感觉，那应该是姐姐单位附近，或者，那就是姐姐的单位，但是我不敢问。现在想来，那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县城而已，而它所展现给一个乡村孩子的形象却有着明确的阶层与距离。

穰县，曾经是“逐鹿中原”最重要的战场，历史上这里发生过许多残酷的战争，遭受过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穰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灭绝。但由于地理、气候与交通上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几乎出现空白时，很快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移民迁徙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

穰县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小麦、棉花、烟



草、小辣椒、花生等，素有“粮仓”之称，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的生产基地，也是棉花、芝麻生产的重点县。这里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

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地上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被吓住了，他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穰县来说，那些只是风景而已。县城火车站的落后与肮脏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个保守小城内在的顽固性格，它也是中国内陆县城的基本缩影。

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九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庭。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大人们这一桌也是高声阔

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到餐馆吃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显然有点害怕，他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庭场面。

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对于她们而言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大家都十分兴奋。

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只是短暂停留，这次，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块儿生活，一起重温过去的温馨，回忆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

##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有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着，大型的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原本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早已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整个乡村最显在的变化就是路的改变。道路不断地拓宽，不断地增多，四通八达的公路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那时候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上六个小时才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青春焕发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

仿佛永恒。

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甚至更加遥远。前两年，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马路的，原野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

今天路上已经不见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时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需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吴镇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

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上可谓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似乎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怀着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镇里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一些极少的商人之外，镇上的居民大多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将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带上街以物换物。

现在，吴镇已经成为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建筑，很现代，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更加显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原来的一些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却给人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

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了一间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过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最近他又和同学做起“房地产”的买卖。哥哥家的门口堆满了沙子、石子、钢筋，混凝土机轰隆作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的一幢，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自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我仍然有些忧心忡忡。

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村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家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一阵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那时候觉得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

然，也有美好的事情，那时候正流行琼瑶、金庸的小说，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那段我最害怕的路上，我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

死去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其实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了荒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清脆的鞭炮声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打破了沉默，似乎也惊醒了那边的魂灵。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多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而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

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依稀熟悉却突感陌生的面孔，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建起的二层小楼，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的几个兄妹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干活也不是能手，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爆，几次离家出走，又被道宽追了回来，最终还是走了。道宽因此而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我们家的老屋。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了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成了临时的厕所，还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把这里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依稀可见妹妹当年学字时在墙上写下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那些诗，姊妹几个笑成一团。

母亲的墓地在村庄后河坡上的公墓里。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



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而那坟地也将是我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坟前，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和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曾经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 梁庄往事

父亲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对三辈以前的村民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虽然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是想起父亲，想起他的一切，却还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我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

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我们家也因此而遭了不少罪。父亲对建国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了然如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而且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而参与的。

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混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也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与豁达。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对于死亡。

你爷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在养老院挨饿死的，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养老院）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

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得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1960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

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的保管员，他家饿死的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

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得最狠。

1960年2月死人最多，原来每天人均口粮是“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的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的哭爹，有的哭妈，有的哭娃。

1962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出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成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公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半夜就赶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

浮夸风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密得兔子都钻不到麦棵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棵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

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

我从小就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就挖个干沟。

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他的记忆力却是惊人地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仍沉浸在回忆中。

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上好几勺辣椒。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

吃过午饭，父亲又开始絮絮叨叨了，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在他的叙述中也逐渐变得清晰了：

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

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韩、梁、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

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

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干起，干了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长方形头，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传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1950年秋回来后，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都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被枪毙了。

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

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做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穿得整整齐齐就上吊了。死前还吃的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

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1957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sup>[1]</sup>、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

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

另外一大家是韩建文家，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过

春节时，全梁庄的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

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得很，所以，也不受尊重。

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后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个和第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

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

有“光棍儿”<sup>[2]</sup>，也有“老鳖一”<sup>[3]</sup>哩。但是，梁家人会政治斗争，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元老，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以前的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他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

梁家光出那鲜点儿<sup>[4]</sup>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



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父亲连车子都没下，当天又被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还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儿在南菜园。

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才。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

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

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得很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有人编顺口溜：“去的时候活蹦乱

跳，回来响支鞭炮；去的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

周利忠的闺女春荣出嫁前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的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

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有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

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sup>[5]</sup>。

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

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

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我小时候几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也几乎同龄，但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从来不邀请别人到她们家里去玩。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都充满着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的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

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不同角色的定位。两百多年来，梁姓和韩姓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梁姓在文化上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而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信主很排斥，也许他们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则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政治斗争，但是，经济上却一直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

已经夜里十一点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嫂子，还有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在电脑上啪啪打字的声音。全家人都沉默着，似乎在为整个梁庄思索，带着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

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有某种契机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去思考，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到这一境界之中。

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 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

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地外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还有八九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哥，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妻子，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

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要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



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只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在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他们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同吃同住。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他们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

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够养家糊口，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人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留在村庄的家庭也多了一项租地经营，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

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地盖新房，生活过得比较滋润，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到村庄，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还有经济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

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拥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刚刚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括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这巨大的“流民潮”惊呆了，并认为对农民的“释放”将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火药筒”。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认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他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

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依然会听到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抱怨，我们依然能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尴尬。进城的农民打工者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只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们给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间。他们变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们认同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通过婚姻、言传身教等方法，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做过多的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

---

[1] 逼财：当年农村清算地主时的一种说法，即“要彻底清算地主，把地主家隐藏的财产也逼出来”。

[2] 光棍儿：有头有脸的、耍得转、耍得开的人。

[3] 老鳖一：老实人，在农村总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负。

[4] 鲜点儿：有代表性的。

[5] 二货山：耿直、倔强，不懂人情世故。

## 第二章 蓬勃的“废墟村庄”

1990年始，穰县开展“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村庄建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村庄建设迅速发展。在道路建设方面，群众按照“想要富、先修路”的思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打通所有村庄的主次干道和进户道，实现了村村通汽车。随着农民对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日益提高，建设局村镇办在各乡镇推广农村建房通用图纸，实施村镇规划，建起排房，修通了村内道路。群众住房结构由过去的土木结构变为砖混结构，不少农户盖起了楼房，部分农户还建起了商业用沿街门店房。

——《穰县县志·村镇建设》

## 第一代打工者：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家

从梁庄到吴镇学校的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着村里坑塘边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处是梁光栓家盖的一个小土坯房，极小极小，也没见用过，却成了梁庄村最显在的标志；经过吴镇北头回民区，沿路有茶馆、羊肉店、小百货店；拐进镇上许家那条小道进镇子里面，路边有一个厕所；在其中一个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开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后，就是吴镇的主街道，新华书店、供销社、五金店、乡政府，紧接着就是乡中心小学和中学了。这条路一共有两公里多，我每天都要来回走六趟。

现在，和父亲从吴镇沿路走回来，我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父亲说，那是镇子南头，这是镇子北头，那是街上许家……我很茫然，虚飘飘的，脚仿佛悬在半空中，怎么也不踏实。

到了新公路的交叉口，父亲说，这算到咱村了，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筑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中间夹杂一些旧房屋。父亲说这些都是新宅基地，留在村里的那些老宅基地要么便宜卖给了别人家，要么干

脆就不要了。

拿着老屋的钥匙，我和父亲准备再次回去“寻宝”。每年回家我们都会回老屋一趟，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在这里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一张旧相片、小学的作业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初中一年级时的一个日记本，我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通向老屋的路几乎被杂草封住，我们蹒跚而过，有几次差点被草绊倒。打开老屋的门，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中间，看着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我百感交集。靠后墙有一个泥糊的长条几，上面摆放着许多东西，中间是毛主席像，配在两旁的是挂在墙上的对联，两边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镜框。条几下面是一个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各种物品。条几前面是一张高的大桌子，春节这里会摆放供品，平时会放一些杂物，这里也是我们写作业的地方。北方农村家庭大多有这两样东西。大桌子的正上方是顶棚，为了防止房屋梁上掉的灰尘落到人的身上，父亲使用竹子和硬纸糊了这个顶棚，上面还扔着至今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册。

我在条几和大桌子上仔细翻捡，又在条几下的格子里摸了又摸，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难道老屋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忆的凭证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册掉下来，反倒是成堆



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东屋和西屋的屋顶上有两个大洞，地面有两个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东屋靠后墙的角落里还放着那张大床，床的木头已经变成黑色，落满了泥和灰尘，从下面露出一角破旧的棉絮。这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用的床。床头放着一个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之一，也是当年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这箱子里面曾经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我曾经摸到过一個煮熟的鸡蛋，发现时惊喜异常。我拿着鸡蛋偷偷地吃，吃一小块儿，就到院子里看一下。那时，家里人都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许多年之后，大姐告诉我，我一从里屋出来，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有蛋清，我再进屋，大家都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这样几进几出的，所有人都憋着笑。西屋是放粮食的仓储，也是我们姊妹长大后住的房间。后来哥哥结婚，我们又重新回到东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有点心跳，北方乡村的房屋并不隔音，三间房屋之间只有一个高高的隔断墙，旁边房间的任何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隔断墙上还挂着各种各样的农具。

院子里的老枣树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见证了老屋的颓败。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

间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身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和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枣树。每年暑假，正是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时候，我们睡在枣树下，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到8月中下旬，树上半青半红的枣子，吸引了无数顽皮的少年。时不时有瓦片、土块落到我家院子里，“蹭”地蹿出一个人影，捡几个枣子，又迅速蹿了回去。那时，我和妹妹总是和一班孩子斗智斗勇。9月中下旬，选一个中午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哥哥会和他的几个好哥儿们上树，拿着棍子打枣，或是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拼命地摇树。“哗啦啦”的枣子落地蹦跳着，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满足和幸福。不知为什么，几年前，老枣树不结枣了。现在，正是夏天，老枣树大半的身躯干枯着，只有一些稀疏、泛黄的叶子证明它的生命还存在着。我们都离开家了，枣树那白色的小花、青色的小枣，那泛着诱人光泽、圆润饱满的红枣，给谁看，又给谁吃呢？

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壁残垣，我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在我的童

年、少年时代，这里曾是村庄的中心，光亭叔家门前的那棵大树下，有一个大平台。夏天，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是歇凉的中心。即使到了半夜时分，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而如今，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锅盖，仿佛昭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机。有的房屋甚至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

这里是谁家？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了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正对着我们家前面的是拐子常家。拐子常，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父亲和村里的人常常讲他，一家人吃面条，拐子常总是把筷子在锅里一搅，面条全串到自己碗里，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汤。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墙，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那黄泥水就哗哗地流到我家的院子里。现在，只剩倒塌的一垒垒黄坯和一面墙壁了。再往前边，是拐子常的弟弟家，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小孩儿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